

孫
科
著

中
蘇
閩
係

中
華
書
局
印

孫
科
著

中
蘇
關
係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中蘇關係

目次

國父與蘇聯	一
中蘇外交關係	九
蘇聯的對外政策	二六
關於「蘇聯立國精神」答客問	三九
附錄	四九—六四

中蘇關係

國父與蘇聯

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在英文「自由中國」雜誌發表

一

國父畢生致力革命，其目的在救中國，同時在救世界。救中國祇是他的起點，救世界才是他的終極，他在彌留時給予蘇聯朋友的遺書，對於他一生的希望，表示得最爲明白。那極沉痛而又興奮的詞句，將永久的嵌在我們的腦海中。遺書上說：『你們是自由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之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留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下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通力合作，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歡迎強盛

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這封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國際遺書，真是前所沒有，爲人類指示出創造新世界的平坦大路。

救中國與救世界原是不可分的。中國之不自由不平等，是世界不自由不平等的一部分。人類五分之一的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要不獲致自由平等，世界上自無真的自由平等可言。而我們倘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同時自己也須要求世界之自由平等。傳染到列國整個社會的帝國主義的疾病，是舊世界的一種如癩般的惡症。如果我們能醫治好這種病禍害，我們將爲人類造福不淺。

國父所以在長期的孤軍奮鬥中無時不企望新革命力量的興起，共同去打倒世界的不平。這個希望，直到他逝世前幾年，才從俄國爆發出來。那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

當時世界各國，正從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大戰中，停止下來，看見蘇聯革命成功『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并且要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大家於是都起了一種害怕蘇聯的心理，一齊聯合出兵去打蘇聯。所有關於蘇聯革命的紀載，無一不造作種種謠言，詆毀蘇聯，攻擊蘇聯。可以說全世界都反對蘇聯，要把這個新興的革命力量消滅。

然而，國父卻站在數十年不變的革命立場上，站在救中國救世界的仁者心地上，絲毫不爲那些虛偽欺騙的謠言所蔽，反而對它寄以無限的同情和希望。他說：『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空前未有。』又說：『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爲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爲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

文化各不相同的民族相安，對外要扶助被侵略壓迫的弱小民族謀求解放；在民權問題上，它要由沙皇專制政治，過渡到全民民主政治；在民生問題上，它要由貴族大地主的資本主義經濟，進步到人民共有共享的社會主義經濟。

這三個問題，世界各國，都還沒有解決，但是蘇聯卻在艱苦的環境中，經過二十多年革命的奮鬥，終於把它一一完滿地解決了。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國父不及親見，也料不到三民主義理想，竟然先在蘇聯實現。就是到現在，國內的智識界，還有不少不明白蘇聯建設成功，就是達到三民主義理想的。

蘇聯究竟是怎樣解決這三個問題，為什麼說，他們解決了這三個問題，就是達到三民主義的理想呢？

在民族問題方面說，大家知道，蘇聯是多民族的國家，在帝俄時代，統治階級的俄羅新貴族，對內厲行專制的統治，對外發展野蠻的侵略，民族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列寧斯大林早認定，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不但是世界革命的抱負無從進行，就是蘇聯的統一和建設也談不到，所以在建國開始的時候，蘇聯對內便極力推行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聯合蘇聯境內各個不同的民族，建立共和國聯邦，根絕消滅民族間的猜疑和歧視，同時對外推行濟弱扶傾的和平政策，予弱小民族以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

他們用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是什麼呢？就是國父數十年前提倡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

義。我們知道，大凡結合多數民族來建國的國家，必須實行民族一律平等，然後才可以團結一致，對內統一，對外禦侮，成爲富強的國家。否則一到大難臨頭，彼此不能合作，一定要召亡國之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奧匈帝國的滅亡，最近波蘭的滅亡，原因雖然很多，但是國內各民族不能享受自由平等的權利，卻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民權問題方面說，蘇聯自一九三六年頒布斯大林憲法之後，在政制上，便成爲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在民權上，也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達到全民政治的境地。爲什麼蘇聯今日能成爲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實行全民政治，而歐洲其他國家，爭民權爭了二三十年，實行民主政治也實行了一百多年，結果反不能達到全民政治的地步，大家卻說它是虛僞的民主呢？簡單的說，就是因爲歐洲其他的國家，還是實行資本主義，弄到國內少數的有產階級，剝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而蘇聯則廢除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根本消滅了階級，使人人_們在經濟上的地位都得到平等。

因此蘇聯人民，現在不但是享有普通的間接民權，其在地方之各級議會中，且能事實上行使各種直接民權，達到民權主義所主張的直接民權的理想。除了這種純粹政治上的權利而外，更享有工作權，教育權和民族平等權，恰恰符合民族主義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底精神。至就政府要有能方面說，則蘇聯政府之有能，是毫無疑義的。從他建國的過程中，從幾次的五年計劃底偉大成績上，都可以看出來。

就民生問題方面說，蘇聯在一九二八年把鼓勵世界革命的主張暫時放棄，用全部精神轉移到對

內建設，完成社會主義的生產工業化，使國家的力量增強，人民的生活完全解決。她用十年的功夫，集中全國的力量，完成兩個五年經濟計劃，第三個五年計劃也完成了一半，把資本主義國家要用百數十年的工夫才能完成的工業化，縮短了好幾倍的時間。兩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基本重工業，大規模的電氣業，和與國防有關的種種工業都一一完成。現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就是注重輕工業消費工業上面，對於工業貨物和食用貨物的供應，都已大大的增加。

不但在生產方面有這樣突飛的進展，就是在分配方面，也完全得到合理的解決，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現象。所有基本工業的建設都由國家經營，生產工具完全國有，生產的目的在養民，不是為賺錢。個人收入分配也很平均，就是最多收入的和一般工人比較起來，也不過一與十五之比。完全達到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也就是民生主義的理想。

三

我們紀念 國父，就要努力完成 國父的遺志。尤其要慚愧，要省察，為什麼蘇聯以短短的十幾年工夫，便居然達到了我們三民主義的理想，能夠負起救世界的一部份責任。而我們繼承着 國父遺給我們很完備的革命主義，很好的革命基礎，經過十五年的時間，還不能完全實現他的志願，不但是蹉跎歲月，而且使國家今天還在危難艱苦的境地！其惟一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對 國父的主義，還沒有澈底的認識清楚，對於國內外的情狀，中外的學理，還沒有完全的貫澈瞭

解，同時失去了的民族自信心，還沒有恢復過來。所以對於國父的主義，信仰不堅，奉行不力；總夢想世界上還有更新更好的主義；足以救中國救世界。殊不知國父的主義就是世界上最完備、最優美、最能實行的主義。我在上邊所舉的蘇聯實在情形，大家看了一定可以明白。我還要對大家說，就是將來世界各國的有識者，果真要追求人類真正的幸福，也祇有根據三民主義，謀求世界民族權民生三個問題整個完滿的解決，才有希望。

爲什麼我們還不能做到全體國人真正心口如一，表裏如一，絕對奉行國父的主義呢？這個原因，大約有兩方面，一面是由於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人，有些不明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爲何物，不明白蘇聯實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一方面是由於信仰三民主義的人，也有些不明白民生主義爲何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的情形，沒有深刻的觀察和研究，因而常有反對蘇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言論。

其實共產主義祇是人類一種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國數千年前所講的大同。共產主義的目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到那時候，政府也用不着了。這個理想很高，以現在人類思想進步的情形看來，恐怕非千百年後不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最能夠接近這個理想的是蘇聯，中國將來實現三民主義之後，也是向這個理想前進。所以不但是民生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沒有衝突，就是與共產主義也沒有衝突。那麼，爲什麼又引起許多人的疑惑呢？爲什麼有些人要放棄民生主義，採取蘇聯的社會主義呢？其最大的毛病，就是國爲不清楚目的和方法，不明白每個社會都有各自不同的遞演歷

史，不問白對於不同的環境，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的原故。一

中蘇兩國的歷史與環境，互相不同的地方很多，最顯著的例如（一）蘇聯近百年來是一個完全主權的國家，沙皇未倒以前還是一個實行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中國則自鴉片戰爭之後，門戶洞開，受歐美各國物質與資本的剝削，淪為次殖民地，所以在蘇聯沒有對外爭求民族解放之必要，而中國最急要的革命要求，卻無過於民族的獨立與解放；（二）蘇聯在帝俄的時候，貧富階級已極懸殊，中國則無所謂大資產階級，祇有小貧大貧之別；所以蘇聯革命初期，不能不趨於極端，以暴烈的流血手段，剷除反革命的剝削階級、資本階級。而中國現在卻沒有階級戰爭之必要；（三）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較蘇聯落後，而蘇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尙且優容私有資本，在生產落後今日的中國，更不必馬上廢除私人資本，祇要加以節制，而以國家代表佔人口大多數的農工，依據完密的計劃，經營一切基本的有獨佔性的工業，以及私人能力所不能舉辦的大規模事業，便可以使私人資本消息於無形，這種方法上的不同，卻無礙於目的之相同，實在是殊途而同歸的。所以愈是羨慕蘇聯的人，愈應該確信 國父的三民主義，愈應該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愈應該研究蘇聯，和蘇聯攜手。

今天，凡是堅決抗戰，希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人，必須在紀念 國父逝世中，根本剷除一切的疑惑，一切的妄想，一致全誠的信仰三民主義，澈底的實行三民主義，然後才能使中國成為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朝鮮台灣和一切環繞着太平洋上無時不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被壓迫民族，創造新的世界，完成 國父救中國救世界的遺志。

中蘇外交關係

三十四年六月十二三日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外交組講演

我們要研究中蘇外交關係，首先應該研究蘇聯的對外政策，剛才聽說「蘇聯對外政策」一題已由鄧力子先生擔任講授，所以從略。中蘇的外交關係，大概可分為五個時期或階段，每個階段的延續為時約五六年。但在正常外交關係開始之前，却有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為研究中蘇外交關係者所不可忽略遺忘的。

這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是始於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大革命之後。俄國大革命發生，固然震驚了全世界，當時也為各國當局及帝國主義者所痛恨。但在一九一八年即民國七年間，總理從廣州回上海後，首先對俄國大革命表示同情的慶賀。總理當時曾致電俄國大革命領袖列寧先生，慶祝俄國革命的偉大成功。這件在中蘇外交史上重要的文獻，現尚存在莫斯科列寧博物館。同時在辛亥革命成功，國父創建民國的時候，當時俄國革命運動尚未成功，列寧先生以革命黨的身份在其秘密的革命刊物，即現在的「真理報」發表文章，讚揚中國的革命，對總理尤表欽敬。認為中國革命當時雖以民族主義為主導，但是總理所領導的革命，除民族主義外，還包含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要以人民為國家的主人翁，並要求提高人民的生活。這文件現在也存在列寧博物館裏面。這足以證明在中蘇外交關係開始之前，已先有一段革命道義的關係，為中蘇正常外交關係立下良好的基

第一時期——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爲親密提攜階段

第一時期，自一九二三年蘇聯改組成立後，中蘇正常外交關係即隨之開始。民國十三年北京政府與蘇聯大使加拉罕在北京成立北京協定，蘇聯自動放棄帝俄時代根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的特權；如天津漢口的俄國租界，領事裁判權，航海通商等不平等的權利，同時承認了外蒙古屬於中華民國，當時因爲張作霖在奉天不尊重北京政府，故加拉罕另與張作霖訂一奉天協定。其內容除規定東北地方與蘇聯的關係外，餘與北京協定大致相同。蘇聯當時雖一面與北京政府發生正常的外交關係，但深知當時北京軍閥政府不能領導整個中國，認爲中國將來的力量，一定屬於南方的革命政府，所以在加拉罕未到北京之前，他們已另派一位黨代表名叫馬林的到廣州桂林，晉謁總理，商談中國的革命問題。馬林表示蘇聯願意援助中國革命。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叛變，總理於蒙難後離廣州赴上海，那年秋冬之間，蘇聯復派重要特使，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越飛至上海與總理接洽，商討中國革命問題，結果發表了共同宣言。蘇聯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尤不能試行於中國。承認中國在國民革命階段上，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所以蘇聯自始即表示贊成中國革命以三民主義爲領導原則，並願意援助中國三民主義革命建國的成功。十二年春天，總理重返廣州。總理預備進行黨的改組，乃聘鮑羅廷爲政治顧問，鮑氏於十

二年春夏間到廣州，總理派定同志若干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研究改組本黨各項有關的事宜，並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果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總理領導之下於十三年一月在廣州舉行，產生了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確立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從民國十一年到十六年，這五六年間，中國革命得到蘇聯的寶貴援助，可以說是中蘇提攜最親密的時期，雙方關係的友好爲前後所僅見，不但黨的改組，得到蘇聯顧問的贊助，就是建立黨軍也同樣曾經得到蘇聯軍事上的援助。蘇聯當時派有參謀團到廣州，由加倫將軍率領——加倫將軍原名布魯齊爾，到中國時乃化名加倫。在加倫將軍之前，尚有巴夫羅夫將軍來粵，巴夫羅夫將軍跟隨總理到東江督師，清勳陳炯明的餘孽，到石龍行營時偶因失足致墜水死。總理派令總裁蔣先生擔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黃埔軍校創立之時，深得蘇聯的援助，學生所用槍械，大部由蘇聯接濟，從海參威派船運送到黃埔。其後黃埔學生軍平定商團之亂，和東征北伐各役，均獲成功。

中蘇外交關係，在此時期，實不限於普通的外交關係，普通的外交關係在那時，蘇聯是以北京政府爲對手，但是中蘇良好的革命外交關係，則建立在其與廣州的革命政府的關係上面。從黨的改組，黨軍的建立，乃至北伐至長江，都得力於此種良好的關係。但在此期之後半期，從總理逝世後即開始發生暗影。這種不幸的暗影是由於內部問題不能解決，共產黨自十三年加入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後，在北伐進展到長江一帶的時候，主張農民武裝暴動，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國共之間的裂痕至此乃無法彌縫，而演爲清共之役，結果國共兩黨分家後，十六年冬共產黨即在廣州暴動，事平後

本黨中央在上海舉行臨時會議，決議與蘇聯絕交。當時國民政府在南京，由外交部長伍朝樞先生通知蘇方，斷絕外交關係。自此以後，中蘇外交關係，由親密時期竟轉入惡化時期。

第二時期——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為惡化絕交階段

第二時期，自民國十六年春夏間至二十一年秋。在此時期，中蘇兩國間可說已沒有外交關係。蘇聯在中國使領館，軍事參謀團，黨的顧問，均相繼離開中國。

至十八年秋冬，且有過一段中蘇軍隊武裝衝突事件。這就是起於東北地方長官張學良誤聽宵小的搆弄，用武力行動企圖從蘇聯方面搶佔中東鐵路的事件。衝突結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吃了一個大虧，被蘇軍打敗，不得不停戰媾和以爲了事。

此是中蘇關係惡化，雙方誤會最深的時候。這是很可惜的，因爲中蘇兩國在此時期不但失掉很好的合作機會，而且種下不幸的惡因。民國十六年，在中蘇絕交以後四年，即發生「九一八」之瀋陽事變，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中國，佔領東北。我們回溯此段不幸歷史，覺得假使當時中蘇關係不惡化，十六年沒有反共絕蘇的事件，兩國能維持友好的革命外交關係，以蘇聯爲與國，也許敵人對我不敢發動侵略。因爲敵人知道中國已與其革命過程中的惟一與國斷絕關係，乃胆敢肆其侵略的野心。在「九一八」以前數年間，蘇聯方面曾有一間接表示，願仍與中國提攜，認中蘇關係惡化，是受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影響，不應因此而牽累中蘇兩國的邦交。爲甚麼蘇聯有此種表示呢？這是因

爲根據蘇聯的看法，日本是要發動侵略的。但先侵略西伯利亞，或者先侵略中國北部，當時不易判斷。但是無論如何，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中蘇兩國是共同的，當時蘇聯國防建設尙未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進行中，重工業的基礎，尙待奠定，日本很可能先向西伯利亞發動侵略，故仍希望兩國能互相提攜。但或因當時我們對蘇聯理解，尙未盡正確，以致錯失機會。「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看日本於侵略東北後，是否將按兵不動，抑或急轉直下，轉向西伯利亞侵略，尙未敢判斷，頗存戒懼之念，認爲如果一任日本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中心，其第二步當可能侵略蘇聯，因此認爲日本侵略蘇聯的威脅不但未減少而且增加。蘇聯因此對中國希望很切，希望中國諒解，而蘇聯亦承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在國民黨不在共產黨，中國不可因清共而絕蘇。由於蘇聯這種政策，及國際客觀的情勢，中蘇關係乃醞釀轉變，此醞釀時期約有一年之久。

第三時期——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爲復交平淡問題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秋天，東北失掉一年以後，政府始決定與蘇聯復交。當時係由中國駐德大使顏惠慶乘在日內瓦國聯開會之機會，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簽訂復交宣言。該宣言內容簡單，只聲明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互派使節。從那時起，顏惠慶即奉命調任駐莫斯科大使。蘇聯亦派鮑格莫洛夫爲駐南京首任大使。他的使命希望先與外交部交涉，訂立商約。當時汪精衛以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他與鮑大使談判商約，故意提出種種困難問題，要與蘇聯算舊帳，要求蘇聯賠償革

命時期所沒收的華僑財產。但是究竟華僑當時所受的損失多少，我們自己亦無正確調查。即使有調查，亦非蘇聯所能承認，因為蘇聯大革命後，把各國在蘇聯的私有財產統收歸公有，單是法國一國就有幾十萬萬佛郎的債務被革命政府所否認。蘇聯革命後的政策是化私爲公，無論是俄國大地主的財產，英美商人的財產，概予沒收，如果要一一賠償，那便與蘇聯政府的革命政策相違背，蘇聯當然不能答允。當時法英美及歐洲其他國家，與蘇聯交涉都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在精衛復提出中蘇貿易的手續，要求蘇聯同意，中國對蘇聯的貿易，完全經由中國政府特設的對蘇貿易的主管機關辦理，蘇聯不得與中國商人直接買賣，蘇聯的商口只能賣給中國國營貿易機關承銷。蘇聯方面對於此種要求很覺可怪，爲甚麼中國對蘇聯貿易要採取國營辦法，對日本及英美各國則不然呢？蘇聯認爲如果中國對外貿易全部改採國營政策，對世界各國一律待遇，則蘇聯當無用其反對，但如係單獨以之對付蘇聯，即認爲不平等的待遇。當時實業部長是陳公博，陳自以爲聰明，謂蘇聯對外貿易既係國營，則中國對蘇聯貿易當亦應採國營辦法。殊不知蘇聯對英美貿易係採國營，但英美對蘇聯貿易則仍係採自由辦法。鮑大使對外交部當時提出的要求，不予以答應，商談三年多，無何結果。中蘇關係陷於若有若無不離的平淡狀態中。

此時期還有一事，足以加深中蘇關係之隔閡的，便是蘇聯政府把中蘇合營的「中東鐵路」(日人稱爲北滿鐵路)，於民國二十四年春(一九三五年)與倭僞方面協議，出賣於偽滿洲國。我國對此，認係蘇聯方面破壞中蘇合營該路之條約規定，曾向蘇方提出強烈的抗議，但事已做成，終

無轉圜辦法。在蘇聯方面，則認為中國無力維護自己的主權利益，乃被日寇侵佔，何異等於事實上廢止中蘇條約之規定。因此蘇政府因為中蘇合營中東鐵路局面，已無法維持，遂不得不將蘇方權益，毅然售脫，以為暫時避免對日磨擦衝突之計。若他日中國抗戰勝利或蘇聯對日作戰，則中東鐵路所有權當然可由中蘇兩國收回，而此一懸案，屆時可以迎刃解決，不再成爲困難問題了。

第四時期——自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爲助我抗戰階段

鮑大使由二十二年到中國至二十五年，三年間不斷努力與中國舉行談判，先後回國請示三次，其最後一次係於一九三七年四月杪回到上海。本人曾與他敘談，問他這次從蘇聯回到中國來，有甚麼新的使命。他說：我這次回中國來，頗抱樂觀，奉了敝國政府指示的具體方針，希望能有所成就。本人問他，甚麼具體方針。他說：蘇聯爲表示對中國政府好意起見，擬借給中國五千萬元信用借款，名爲機器借款，中國可以此信用借款向蘇聯定購機器及軍火。此非出自中國之要求，乃蘇聯政府藉此以表示對中國的好意。我說：這很好。旁的還有甚麼使命嗎？他說：蘇聯擬向中國提議，希望中國發起召開太平洋和平會議。並繼續說明其理由：謂中國東北已爲日本所侵佔，如日本繼續發動侵略，首當其衝者當仍爲中國，如中國向美法英及在太平洋有關各國提議召開太平洋和平會議，蘇聯將首先贊成，並願向各國疏通使能共同接受中國的提議。本人問鮑大使，此種和平會議是否併請日本參加。鮑大使答：當一併請日本參加。如日本接受邀請參加會議，中國當可提出東北問

題，日本如提抗議或竟退席，則和平會議即爲日本所破壞，亦即與日本負破壞太平洋和平之責。如日本不參加會議，則其破壞和平的行爲更屬明顯。如此英法荷都可認識日本是侵略者，公認日本爲世界的公敵。鮑大使並謂第二步，中蘇可進行訂立互不侵犯協定，第三步乃可以成立軍事互助協定。

當時外交部長是王寵惠先生，鮑大使於五月間與王部長商談。關於召開太平洋和平會議一點，王部長很謹慎，認爲不宜由中國單獨發起召集，以聯合英法蘇共同發起爲佳，商談尙無結果，而「七七」事變即已爆發。蔣委員長當時與王部長及本人均在廬山，七月八日早晨，蔣委員長約王部長及本人談話。委員長謂昨日蘆溝橋事變，可大可小，如係局部事件，當可稍拖延時間，俾吾人得所準備，如立即擴大，則非全面抗戰不可，而欲抗戰，最有關係者爲蘇聯的軍械供應及互助協定等問題的進行決定。委員長並囑本人及王部長立即下山赴滬與鮑大使商洽，本人翌日即與鮑大使在上海晤面。要求鮑大使設法簽訂中蘇信用借款，互助協定，以實現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鮑大使謂第一點可商量，至簽訂互助協定期時已過遲，並謂互助協定之目的在避免戰爭。「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中間相距六年時間，如「九一八」以後中蘇簽訂互助協定，也許日本不敢再發動「蘆溝橋」事件，本人謂如現在即簽訂互助協定，當可阻止敵人再度深入。鮑大使謂：日本現已發動戰爭，中蘇如簽訂互助協定，蘇聯即須參戰，但蘇聯目前尙無充分準備，無異自招日本之進攻，權衡利害，當非最善之策。其後鮑大使回南京與王部長談判，於八月二十一日簽訂中蘇互不侵犯協

定。一面相約彼我兩國互不侵犯，一面假定有第三國侵犯簽約國任何一方時，其他一方約定不予此三者以任何之幫助。其次關於信用借款之接洽，政府派楊杰爲代表負責進行，當時鮑大使奉召返國，楊氏因之同往莫斯科，接洽軍火之供應。楊氏到莫斯科向蘇聯當局商洽，蘇方完全答應，經新疆輸送飛機及軍火至大後方，不及兩個月，到一九三八年春天，已超過信用借款國幣一萬萬元之數。當時委員長電楊杰商訂二次借款合同。蘇聯國防部長伏洛希洛夫元帥謂第一次借款合同尙未簽字，手續未完備，並將帳簿單據送交楊代表，楊答以須先送回漢口核對，才能簽字，蘇方認爲如此則軍火供應只得暫行停止。當時本人由莫斯科已往巴黎，接楊代表電告轉回莫斯科。因楊氏爲軍事代表，不能逕晤斯大林先生，要本人晤斯大林面洽以謀打開僵局。本人回莫斯科，告其經過及請成立二次借款，斯云：中國信用借款既已超過中國法幣一萬萬元，再將第一次信用借款改作五千萬美元，差不多等於二萬萬元，同時再予第二次借款五千萬美元。本人當時因事回巴黎，簽字事宜均由楊代表辦理，延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始正式簽字。不久第二次借款也支用完畢，政府命本人進行第三次借款，本人於二十八年三月底離重慶，四月中抵莫斯科，當時歐局緊張，英法均有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謀與蘇聯訂立軍事協定。本人在抵達後三個星期，才晤見斯大林先生。在未晤見前，已先將商洽的事項具備文件，送由李維諾夫外長轉送斯大林。晤面之時，斯大林頻以中國抗戰情形爲問，談話一個鐘頭，尙未提及借款的事情。嗣經本人問及，斯大林先生才說一萬五千萬美元的借款，蘇聯極願意照辦，沒有甚麼問題。並即席囑蘇聯對外貿易委員長米高陽與本人商訂合約。同

時米高陽更表示希望中蘇商約能早日成功，本人即將預備好的商約草稿交給米氏，經蘇方研究幾個星期後送回一個修正案，改爲中蘇通商航海條約，內容均以平等爲原則。蘇聯得派商業代表來駐我國，因爲蘇聯的商業無論對外對內的都是公營，蘇聯對外貿易更是國營事業，蘇聯對英美等國亦派有商業代表團。商業代表的地位等於大使館的參事，代表團團員得享受外交官的待遇，可以密電本拍發電報，代表團團長與團員間或團員間發生爭訟，中國法院不予受理。代表團設在大使館所在地，並可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蘭州五地設商業代表團辦事處。當時天津上海漢口廣州都已淪陷，只有蘭州可設辦事處。蘭州所以需要設辦事處係因應事實上的需要，蘇聯接濟中國的軍需物資，和中國易貨所還給他們的物資都是以蘭州爲交接地點。代表團的辦事處實等於英美的領事館，領事館的職務是管理商人貿易事宜。該約簽訂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後經中央於十二月間方予批准，批准後蘇聯曾經公布，中國因恐旁的國家或起誤會當時沒有公布。以領事館而言，當時英美在蘭州均無領事館，但現在美國在蘭州，因事實的需要也設有領事館了。該商約不包括新疆與蘇聯的貿易，因爲當時新疆情形特殊，蘇聯在新疆設有蘇新貿易公司，另有制度。商約簽訂以後，雙方根據合約進行，幾年間，關係相當好轉，蘇聯不斷以武器接濟中國，並派飛行員來協助，蘇聯的軍事代表團最盛時達一二百人，中蘇關係亦相當接近。但是第四期後半期因蘇德戰事發生，蘇方無暇東顧，軍需物資的接濟因而中斷，軍事顧問也相率回國，兩國的關係稍趨冷淡。其中的原因除德蘇戰事的關係外，尚有若干誤會，同時中國內部不能團結，行動未能一致，因此這幾年來中蘇外交關係稍有遺憾。

第五時期——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爲誤會疏懈階段

自德蘇戰事發生後，蘇聯在歐洲担任反侵略戰爭最重的責任。所以不能繼續接濟中國，中蘇關係比較冷淡已如前述，但亦互有誤會之處，蘇聯對我們最大的誤會，就是因爲三十年春發生之新四軍事件，蘇聯認爲國民黨不能和共產黨合作，中國抗戰局面或要受不良的影響。當時邵力子先生在莫斯科任大使，適約宴蘇聯外交當局，自莫洛托夫以至次長，參事等，期前已正式約定，不料宴會之日，莫洛托夫通知邵大使謂臨時有事不能如約，邵大使當時以爲外交部其他的人員當可如約，結果竟全體沒有到會。在外交禮節上，很少這種例子的。過兩天知道國內發生新四軍事件，才想及莫洛托夫等未到宴或係得到是項消息之故。自新四軍事件以後，蘇聯報紙便很不客氣的批評中國。反之，我們對蘇聯也有若干事情不能了解，最大的誤會就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底蘇日成立中立協定。我們對此協定發生反感，以爲蘇聯停止對中國的援助，不重過去的交情。蘇聯當時也沒有加以甚麼解釋。其後經數年事實的證明，才感覺當時我們對蘇聯不諒解，實係未明瞭當時蘇聯的處境。當時希特勒已把歐洲許多中小國佔領，英國在歐洲孤立，美國仍在中立，蘇聯獲得種種情報預料德國必進犯蘇聯，因此不得不採分離敵人的政策：解除東面的威脅，使一旦事發，可無東顧之憂。果然蘇日中立協定簽字以後爲時不過兩月，德國即大舉進攻蘇聯。蘇聯因有蘇日中立協定，得以專力對付希特勒。在本年四月初到了德國失敗的時候，蘇聯即毅然宣佈廢棄日蘇中立協定，我們過去的誤會也

就完全消除了。今後中蘇外交關係，應該日趨密切親善，並且進一步在遠東共同作戰，擊敗日寇。這是今後另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今後應為共同對日作戰親善友好階段

我們現在要研究蘇聯是不是要參加遠東擊敗日寇的戰爭。本人一向的觀察認為德國戰敗以後，蘇聯必然要參加遠東的戰爭的。現在各種的情報都異口同聲的證明蘇聯一定參戰，以求縮短對日戰爭的時間。

關於遠東戰事的前途，美國軍事家有許多擬議的軍事計劃。一種是準備應付最不利的情形的。這種計劃準備對日長期作戰，認為敵人的力量仍然很強大，就是盟軍在日本本土登陸，佔領東京，也不能結束戰爭，因為敵人的陸軍大部份屯駐在亞洲大陸，敵人如能集中二三百萬陸軍，死守大陸，盟軍便要費很大的力量始能予以消滅。假使蘇聯不參加遠東的戰事，那末必然要延長對日戰爭的時間。另一種計劃是縮短戰爭的計劃，這種計劃能否實現，則視乎蘇聯是否參戰。因為中國大陸最接近的是蘇聯。國土毗連一萬多里，由西伯利亞越過蘇聯邊境即為中國之東北，蘇聯不參戰則已，如一旦參戰，紅軍一出即抵達滿洲偽國，也許交戰數個月，便可佔有東北，敵人喪失其在大陸上最大的根據地，戰事就容易解決。

究竟蘇聯有參加遠東戰爭的表示沒有呢？根據過去的事實，蘇聯是屢有這種表示的。例如前年

我國赴英訪問團，有幾位團員曾到近東土耳其參觀，在某次宴會上，蘇駐土大使，曾對他們表示，希望中國不要懷疑蘇聯，一旦德國戰敗，歐戰勝利結束，蘇聯即參加對日作戰。莫洛托夫宣佈廢棄蘇日中立協定的時候，更露骨的責備日本曾幫助德國攻打蘇聯，並且在遠東對抗蘇聯的盟國英美，認爲日本早已破壞蘇日中立協定。此外，蘇聯本國的報紙雜誌反日的宣傳近來也屢見披露。

本人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第一次到莫斯科訪問的時候，即有一深刻的印象：認爲蘇聯終必參加遠東戰爭與中國併肩對日作戰。當時蘇聯人士認爲中國因重工業不發達，要堅持抗戰當然要友邦援助，不但應接受蘇聯的援助，同時還要爭取英美的援助。認爲當時美國每年仍以幾百萬噸廢鐵及飛機汽油發動機等供給日本，係中國不極力爭取美國援助之錯。其幫助中國抗戰，反對日本侵略之情緒，溢於言表。本人當時更以蘇日通商的情形爲問。他們說：蘇日間早已無貿易可言。並謂自「七七」事變以後，在一年多的期間內，蘇日的商務不值十萬美元，而且僅限於庫頁島的石油輸出，純然係條約的關係。而日本則因收買中東鐵路，以貨物付價，故有若干來往。在事實上，蘇聯更從張鼓峯和諾門坎兩次事件中，給予敵人以莫大的教訓。諾門坎事件發生之時，是一九三九年五月間，莫斯科報章沒有披露，到了六月底，莫洛托夫在郊外招待本人及楊大使，才對我們說，上月日本以大量兵力侵犯外蒙古，敵人係試探性質，如蘇聯無力抗拒，敵人可能侵佔外蒙。由此種種事實，可見日蘇原係天然仇敵，其利害衝突終必訴諸武力，始能解決。

總而言之，蘇聯過去未參加遠東的戰爭，實係爲避免東西兩面同時作戰，俾得集中全力應付德

國之敵，英美對此不但深加諒解，而且要求蘇聯集中力量先打倒德國，暫置日本不理。魁北克會議，羅斯福和邱吉爾亦決定要集中力量先解決歐洲而後及遠東。我們立場當時反對此種見解，因為中國抗戰最早，損失最大，痛苦最深，所以希望要先行解決日本。彼時蘇聯尚未參加歐戰，英國且在德軍強大威脅之下，美國因此亦極力支持英國先歐洲後遠東的主張。現在整個局面已完全好轉，德國已完全解決，英美全部力量將陸續東調，蘇聯參加遠東戰爭亦已有蛛絲馬跡可尋，一旦蘇聯對日開戰，遠東戰事便可能急轉直下的勝利結束。

今後中蘇的外交關係，必然進入很親善友好的階段，可以恢復總理在生的時候那種革命同盟的關係。此種中蘇外交新階段現在業已開始，前途非常光明樂觀。前一個月，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總裁有很正確的指示，總裁指示我們同志，要改變傳統錯誤的所謂「遠交近攻」的外交政策。將來日本解決以後，如仍保持此種政策便絕對錯誤，因為那時只有蘇聯是與我們最近鄰的國家。我們應完全屏棄遠交近攻的傳統觀念，實行「遠交近親」的外交政策——就是親蘇政策——一定要和蘇聯親善，永遠保持親善密切的關係，然後中國的復興建國，長治久安才有最大的把握。如果蘇聯對中國有所批評，我們應該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如果蘇聯有觀察錯誤的地方，我們應該拿事實予以解釋。這樣今後必能重建中蘇的親善外交關係，共同合力擊潰日寇，在戰事勝利結束以後，協力防止日寇的死灰復燃。在遠東方面與英美蘇法四大盟邦合力維持遠東和平的局面。蘇聯是歐亞兩洲最強大的大陸國，中國與蘇聯利害關係最密切，所以今後我們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就是

親善提攜的政策，希望各位同志能確切認識我們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關鍵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前途，致力中蘇邦交之親善。

x
x
x
x
x
x
x
演講畢並答復問題數則，問答大意如下：

一、問：聞蘇聯贊成中共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否足以影響中蘇邦交，中蘇邦交之增進，是否應先解決中共問題？

答：我們既以親仁善鄰爲目的，既欲達成中蘇邦交密切的目的，則內部如有任何因素足以障礙親善政策之推行者，應自行求其妥善解決。中共問題是否足以影響中蘇邦交要看將來的演變如何。關於解決中共問題，六全大會決議仍以政治方法——就是和平方法——求其解決。但是怎樣使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參加政府，則尙未作具體的決定。

二、問：蘇日中立條約期滿尙待一年之後，如此是否有礙於蘇聯之參戰？

答：莫洛托夫宣佈廢棄蘇日中立協定時，責備日本曾助德攻蘇，並在遠東對抗同盟國英美。故該約事實上已等於廢止。不必等待明年期滿，蘇聯參戰隨時均有可能。

三、問：蘇聯如出兵逐出敵人佔領東北四省，將來如何歸還中國？

答：應當在蘇聯參戰之前與蘇聯議訂協定，免事後發生爭執。根據歐戰的經驗，蘇聯紅軍未入

捷克之前，貝奈斯總統即與莫洛托夫簽訂協定，規定紅軍進抵捷克後，民政機關由捷政府派人員接收，但受紅軍司令部的節制。

四、問：外蒙現已在蘇聯掌握，前途如何？

答：要看將來中國的力量作風和與蘇聯親善的情形如何而定。

五、問：中共問題對中蘇邦交關係如何？蘇聯對中共真正態度如何？如對中共問題無有效辦法，恐中蘇邦交難以樂觀。

答：大家而努力，澈底求中蘇邦交親善。要掃除個人心理上的障礙，多研究多認識蘇聯。如蘇聯有懷疑，我們應從事實上予以解釋。

六、問：中共自有軍隊，自有政府，中央已屢為讓步，而蘇聯則同情中共，蘇聯如不放棄袒共政策，中蘇邦交前途如何？

答：蘇聯如參戰，當有條約關係，蘇聯或有贊同中共之處，或以為中共作風較國民黨為佳。事實如此，吾人應設法使蘇聯輒改改變。中蘇固宜互相親善，但吾人更須與蘇親善，中國只可與蘇為友，不可與蘇為敵。中蘇為友，戰後即可共同致力安定遠東。此純係客觀現實問題，不能憑吾人之主觀以謀解決。吾人應自省以兼改善。

七、問：蘇聯計劃經濟可否為吾人借鏡？

答：蘇聯三個五年計劃成功，堪為吾人借鏡，但或不能全部採用。中國要行計劃經濟，先要有

正確之統計數字，蘇聯過去之經濟技術設備均有可取之處。蘇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有些方面，較英美更進步。前幾年已用新方法利用地層煤炭。過去用煤方法必須開採，把煤炭開掘出來，再予以燃燒。蘇聯的新方法，不用開採，只要發現地層有煤，即鑽許多井口，從井口打進養氣，使煤在地下燃燒，抽出煤氣，即可用以發動機器。美國近來研究此新法，很感興趣。又醫學上輸血之辦法亦蘇聯先使用。蘇聯用科學方法將各類血型之血先行從人身抽出，分別貯藏，而能保持不變。免去臨時抽血之不便。

八、問：蘇聯對中共態度如何？如中央對中共割據行爲，萬不得已使用武力以軍事解決。中蘇邦交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

答：中央決定以政治方法圖謀解決。中蘇邊境是中國急切之需要，不可因國內問題，阻礙中蘇邦交。

蘇聯的對外政策

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在中蘇文協香港分會主辦的演講會上講演

主席，諸位先生：

在講述本題之前，本席要先講一件歷史上的事情。從它上面我們不難看出 國父是怎樣一位高瞻遠矚的偉大的革命家，同時也不難看出我們研究學問，應該持何種態度。大約遠在十八九年之前， 國父有一次在廣州召集同志訓話，本席親自聽得 國父當時曾經肯定地這樣說：

「中國革命的前途，和運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當，實有密切的關係。運用得當，可以博得列國的同情和幫助，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多一層保障；否則是要倍加困難的。在列國之中，有兩個國家，尤其和我們休戚有關，這就是我們的近隣日本和蘇聯。假使這兩個國家都成爲我們的盟友，當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獲得其一，我們的革命工作才能順利進行！」

國父的說話是有着深長意義的。第一、確立了我們的外交的基本精神在於敦睦隣邦。第二、在外交的運用上，我們必須爭取主動性。第三、特別值得注意的， 國父當時實際上已經預見到了我們和日本與蘇聯這兩個國家的敵友關係。這就是說，在那時候 國父在世界大勢的研究上，早已獲有結論，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家，而革命後的蘇聯卻是一個和平民族，因此而斷定將來我們和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將是如何的。

不錯，在這次演講裏面，國父並未具體地爲我們指明誰敵誰友。但在此後不久，一九二三年一月與蘇聯代表越飛的聯合宣言，和同年十一月黨改組時的聯蘇政策，以及逝世前給蘇聯的遺書，無疑間地指示給我們以後的外交方向。至於日本，雖然知道它野心勃勃，對我國存有非分之想，然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國父還是希望它能夠懸崖勒馬，不要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所以在北上之前，不辭辛勞，繞道經日本，苦口婆心地對其朝野進言，勸他們不要學習「霸道」，而應該努力於「王道」的發揚。

現在國父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距離這次發言也將快二十年，不管世界有了何等重大而複雜的變化，但國父的遺言遺教，卻永恆地發耀着無限光輝的奇彩。我們至今支持了五十多個月的艱苦戰爭，我們的敵人是誰？還不是國父身前早就警戒着的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朋友是誰？我們的朋友是衆多的，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國父早就明確地指示我們要與之成爲盟友的蘇聯！

國父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他有遠大的眼光，科學的方法，並且他的研究態度是神聖莊嚴的。不僅是爲了研究而研究，而是站在利國福民，人類和平的立場上來出發的，因而才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成爲一個真正偉大的先知先覺者。

蘇聯是一個疆土寬廣，地跨歐亞二洲的大國。在歐洲，列強相處，羣雄角逐。在亞洲，主要的國家是我們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所以一般地說來，蘇聯對環境複雜的歐洲的外交，比之對亞洲的外交要見得更微妙些。惟其如此，歐美人士談到蘇聯外交時，往往認爲它是一個不可解的謎。然而

在本席看來，卻並不這樣。因為在表面上蘇聯的對外政策，似乎撲朔迷離，神祕莫測，使人有目眩耳暈之概，實際上若注重客觀事實，加以分析研究，就可發現它是有着一貫的立場的。它之所以顯得如此的迂迴曲折，變化多端，因為它要應付一個錯縱複雜的局面的緣故。

就蘇聯的對歐洲外交歷史而論，可以分割成四個階段。每一階段有着它的顯着的特徵。

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經過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以至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爆發在協約國與同盟國正在急劇戰爭的時候。革命後的工農政權是極其不穩的，沙皇的殘餘努力頑強地存在着，不斷地予以嚴重的威脅；同時國內經濟的破壞亦達到極點，田園荒蕪，糧食缺乏，以致民生異常艱苦。顯然，在這種情勢之下，穩定新生的政權是為當務之急。

並且，我們知道，十月革命所產生出來的新政權與專制的沙皇政權是斷然不同的。前者是以社會主義為標幟，而後者卻是一個帝國主義。參加協約國和同盟國作戰，在後者可說是極其自然的，但在前者是沒有必要的。

這樣，蘇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便與德國簽訂了勃萊斯特列托夫斯克條約。毫無疑義，從條約本身看來，新政權第一次的對外條約，是一個屈辱的條約，它使蘇聯喪失了相當廣大的土地。在簽訂條約之前，政府內部曾經發生過裂痕，以托洛斯基為首的一派力持反對。但是列寧的主張最後獲得了勝利，使新政權得以用全力去鎮壓反革命勢力，終至屹然不動地穩定了自己，這種成就不能不歸功於此一條約之訂立。不久德國果然失敗，此和約隨着無形失效，蘇聯復乘機收復了一部份失

地。

不過，這一前所未有的新政權的產生，在當時是不能獲得在基本上與它不同性質的列國的同情與瞭解的。且在列國看來，中途與敵國簽訂和約，無異乎背棄盟友。於是有了干涉軍，於是有了封鎖。而在蘇聯的一方面，面對着這種困難，一方面固然在軍事上積極予以迎擊與反攻，一方面更加緊它的政略攻勢，即通過第三國際，而起來號召世界革命，藉以來分化列國的內部組織。蘇聯的對策獲得了成功；一九二四年列國軍隊退出蘇聯，隨着先後承認了這個新生的工農政權，比較慎重的美國則遲至一九三三年始予承認。

第二階段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國社黨當政之前。

當蘇聯對內既削平反動勢力，對外又取得了列國的承認，它的政權是相當的穩定了。這個時候，最要緊的便是建設工作。它必須積極的從事建設工作，才能解決連年戰亂的貧困，才能使開始穩定的政權，逐漸鞏固起來。基於這樣的需要，它的對外政策便有了轉向，即是放棄世界革命的號召，而變成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巨大的三個五年計劃，隨後就成爲全國上下一致努力的目標。不過，這樣的一種轉向，托派是不予諒解的，他們認爲蘇聯仍舊應該繼續其世界革命。

在建設計劃的努力推行過程中間，蘇聯的對外關係是極少的，如有來往，則力求其修好；這是這一階段的特徵。

蘇聯的現代工業基礎比起西歐諸國是要落後些的。當巨大的建設計劃實施的時候，無論在機器

方面或技術人員方面，都感到了缺乏。就是在建軍方面也十分需要外國的幫助。而戰後各國需要恢復其繁榮，正需要着廣大的市場，一般技術人員，是時亦有過剩之概。由於彼此的需要，於是大量的機器和大批的技師，源源不斷地到了蘇聯。其中尤以德國的爲多，人數達數萬之衆。因爲德國是一個戰敗國家，戰後既極貧困，且被戰勝國阻止其擴軍，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原是極自然的趨勢。但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情形便不同了，於是蘇聯的對外政策又有了變化。

這便是第三階段，自一九三三年以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的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用人工的方法在各國之間造成一種均衡狀態，使彼此間得以暫時相安無事，經過了十幾年以後，這種均衡狀態終於漸次無法維持，等到希特勒一旦當政，戰爭的危機實在已經畢露。蘇聯至此便不能不開始感受到西線的威脅。於是也就不能不放棄它的只管理頭苦幹，置身於國際外交圈外的對外政策，而不得不出而周旋於世界政治舞台之上。並且事實上蘇聯經過了這若干年的積極建設，不但它的政權業已鞏固，抑且一躍而爲世界強國之一。那末舉凡一切討論世界問題的場合上，如果沒有它的參加，當然是會大大地減色，這在其他各國自是深切知道的。不過蘇聯此時出現在世界舞台，顯然已不是一個平常的角色，在此後的數年間它不但極形活躍，甚至有着舉足輕重的威力。

實際上蘇聯的活躍外交的開始也許還要早一點。九一八事變時的仗義執言，是爲大家所周知的。此次的發言所揭露出來的集團安全制，是這一段蘇聯對外政策的特點。所謂集體安全制，是針

對着法西斯的各個擊破的戰略陰謀而說的，它的意義在乎要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動的繼續擴大，儘可能的維持原有的世界均衡。顯然，蘇聯所倡導的集體安全制是必須得諸強國的合作，才能以集體的力量約束和鎮壓國際法西斯的猖獗。蘇聯這一階段的對外政策的方針，便是努力於聯絡英法美諸民主國家一致予德義日法西斯軸心國家以制裁。

在九一八事件與一九三五年阿比西尼亞事件上，蘇聯都曾大聲疾呼的譴責法西斯侵略國家，要求民主國家及時加以制裁。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事件上，蘇聯不僅向世界各國力陳不干涉主義之不當；並且以軍火援助政府軍去打擊受着德義領導的叛軍，這都是謀致世界和平的集體安全制的輝煌表現。可惜歐美一般政治家大多格於成見，對於蘇聯這種豪俠舉動，竟未予積極響應。

但在外交上，蘇聯或多或少曾獲有成功的。法捷蘇三國之間的協定，便是一個可喜的紀錄。它在以後並未發揮怎樣的力量，可是在當時對於法西斯侵略國家，不能說是毫無打擊作用的。其時法國政府是人民陣線組織的，蘇聯對它的關係頗為接近，三國間的協定的訂立，當然是出於共同需要；但蘇聯有相當主動性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人民政府之出現在法國僅如曇花一現，不久達拉第便出來組閣。達拉第與張伯倫同為綏靖主義的要角，他們對付希特勒的拿手好戲，祇有讓步與妥協。一九三八年九月舉行的慕尼黑會議，達到了這一悲喜劇的高潮，捷克從此被迫犧牲。蘇聯此一階段的外交上的武器是集體安全制，它持此武器於一九三三年起開始與國際綏靖主義戰鬪，到慕尼黑會議結束，經過了五年的苦鬪，到是時殆已無法再繼續的了。

然而，面對着可怕地強大的綏靖主義，集體安全制還是作過一番最後的掙扎。而在這時候，由於希特勒的橫衝直撞，張伯倫老先生也許也漸漸覺悟到把和平寄托在一紙慕尼黑協定上的不可靠；同時國內人民也起來紛紛批評與責問政府。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莫斯科於是居然出現了英法的代表，開始舉行所謂三國會談。會議進行百來天，卻一無成就，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在這樣緊張的情勢下，討論軍事合作藉以消除危機四伏的戰禍，原是何等迫切而重要的事情，但英法所派的代表不過是些二三流的角色，即此一點也可以測知綏靖主義的誠意如何？結果：代替懸而未決的三國軍事同盟的，卻是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

這協定的訂立，在英法方面驟聞之下，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在希特勒方面從此東線西線兩可之間，有了決定，在蘇聯方面則總算把行將燒及自身的戰火暫時加以撲滅了。關於此協定，論者有兩種說法，一責難蘇聯，認為此協定是這次大戰的導火線；一諒解蘇聯，認為時勢所迫不得不然，無論如何，此後二年來蘇聯國防力的增強，實在為此協定之所賜，那是顯然的。

德蘇協定簽訂後不久，九月初歐戰便爆發，一直到德蘇戰爭發生，蘇聯對戰爭的態度是所謂嚴守中立，這就是置身於戰爭之外。大家想一想，假使不中立又將怎樣呢？參予希特勒一方嗎？這是不可想像的。參予英法一方嗎？社會主義的國家有這樣的必要嗎？蘇聯的這種中立，客觀上於英法一方多少是不利的，所以頗遭世人所非難。惟就蘇聯立國之本來說，戰爭未發生之前，它願以全力來消除它，既已發生了，此時此地，它更有比中立更好的途徑嗎？

不過，德蘇之間雖然表面上是互不侵犯，實際上彼此間的矛盾卻隨着戰爭的發展而日益尖銳。蘇聯對於希特勒的戒備，無時不用其極。在對外關係上的表現，便是先後收復波蘭的失地，收復波羅的海沿岸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與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以及芬蘭維堡的佔領，而把國防線推向前了若干深度。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緊張的局面終於發展成爲戰爭，希特勒撕碎德蘇協定，掉頭東向，進攻蘇聯。至此，蘇聯再也無法維持其中立，而被迫着不得不奮起抗戰。於是蘇聯外交又開始了它的新的一頁，是即第四階段的政策的開始。這新的一頁，其實就是在德蘇協定之前的數年中，蘇聯所且夕求之而未得者之一個再版，亦即是集體安全制的復活。所不同者，彼時戰爭尙未發生，而現在則是戰火遍地，多少國家已被滅亡，多少人民已失卻自由。從前所要求的，不過是怎樣才能阻遏戰爭的爆發，今日所要求的已變爲怎樣才能打倒希特勒，勝利地結束這個戰爭，而彼時與今日的鬪爭着的兩個主體卻仍然未變，一方面是法西斯的野蠻勢力，一方面則是民主國家的進步力量。

然而希特勒的一方，配合他的戰略攻勢，佈置下他的政略攻勢。他把侵略戰爭偽裝成爲反共的「思想戰爭」，希特勒這樣做不是無根據的。集體安全制的所以給綏靖主義一時壓倒的緣故，就因爲後者頑固地拘泥於政治成見，不能推心置腹地與前者協合。希特勒是詭詐異常的，他在進攻這個強大的敵人的時候，必須要陷它孤立無助，才能收得各個擊破的奇效，因此他復再次地要利用英美心理上的弱點，裝腔作勢地做出反蘇的先鋒的樣子來。殊不知時至今日，英美與它之間的矛盾，

已遠超於其與蘇之間的矛盾。戰爭爆發的當夜，邱吉爾便以與蘇並肩作戰答覆了它，接着美國又作了響應。

雖然如此，這一種心理上的弱點或多或少地仍然存在着的。蘇聯爲了自己，爲了世界和平，都必須爭取國際間的反侵略反希特勒主義的勢力團結起來。在抗戰之初，單單用闡明其抗戰是「民族解放戰爭」來打擊希特勒「思想戰爭」的政略攻勢還是不夠的，它必須在它的抗戰過程中間不斷地，多方面地，儘可能地去消除這一種心理上的弱點，才能使國際援蘇運動更迅速而廣大地發展，才能使民主國家更有效地協同作戰，才能在反希特勒主義的旗幟下，集合世界的進步力量。無疑，蘇聯對外政策的第四階段的焦點便在於此。

蘇聯的政略反攻顯然是會勝利的。英美國內的保守派和孤立派的氣憤，逐漸在熄滅。政府所主持的援蘇會議，援蘇行動之外，人民所呼喊出來的援蘇呼聲一天盛於一天。在這種呼聲裏面，頗饒興趣的，我們且已聽見了宗教方面的代表的聲音。援蘇運動，無疑，將隨時日的進展而發展開去，這是一定的。

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向來是友善的。十月革命前的沙皇政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政權，曾經侵略中國，壓迫它訂立不平等條約，如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條約，是侵略黑龍江一帶的一個條約，一八九六年的道勝銀行契約是對我作經濟上侵略的一個條約，一九一五年的中俄蒙協約，是侵犯我蒙古宗主權的一個條約，一八八一年的伊犁條約是侵略新疆的一個條約，一則賠款割地，一則特權利益

極盡不平等之能事，但自十月革命工農新政權建立起來以後，即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一七一九至二〇年先後兩次發表宣言要求中國與它訂立通好條件。一九二四年訂立中蘇協定，這一協定可算是中國近數十年對外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第一個條約。在這以前一年又半，國父與越飛的聯合宣言業已發表，以前的半年，國父的聯蘇政策亦已確立，所以這一協定雖出北京政府，實際上卻受着南方影響的推動的。此後中蘇邦交一度曾陷於惡化，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危害到亞洲和平的時候，中蘇兩國共感有接近的必要，便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恢復邦交。彼此關係即日益密切，特別於文化的聯絡上有良好的成績。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前，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蘇聯方面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者將對我又有新的侵略行動，故向我們作一有價值的建議，召開太平洋會議來約束它；不料正要進行的時候，戰爭卻先發生。戰爭才發生，蘇聯便與我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這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一方面表示了蘇聯對我的友好態度，對於我們在艱苦奮鬥中的人民自是一種精神上的鼓勵；另一方面無異坦白地告訴日本侵略者，他們這種不義的舉動是絕不同情的。事實上蘇聯不僅在精神上給予我們以可貴的鼓勵，而且在物質上也給予我們以最大的幫助。本席所知或經手的借款第一二次是美金一萬萬元，第三次是美金一萬萬五千萬，數目之巨，至今還佔援助者的首位。

總之，蘇聯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也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兩大邦國都有極崇高的理想，立國之本復大迥而小異；並且邊境相接為世界最長之一，此所以兩大革命領袖列寧先生與國

父之要把彼此未來的命運，放在密切提攜上面的緣故。後之者能恪守不懈，兩國的邦交，乃能日益敦睦。

關於中蘇兩國間懸案有下面三件。

一、中東鐵路問題 中東鐵路是沙皇政府侵略中國的一個遺物，一八九六年道勝銀行契約中我們所喪失的權利，但它的性質還不脫為合辦的經濟企業。所以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訂立，規定該路前途只能取決於中蘇兩國。其後一九三三年蘇聯卻把它出賣給日本，絕未得到我們的同意。就法理來說，蘇聯這種舉動是非法的。據蘇聯方面的說法，則以為東北已遭侵略淪陷，為環境所迫，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二、外蒙問題 外蒙是沙皇政府對我們侵略的目的之一，一九一五年的中俄蒙協定中喪失的一片土地。沙皇政權崩潰以後，外蒙於一九一九年自動歸附我國。但是時我國內亂頻仍，日本乃乘機助白黨攻陷庫倫，擁活佛獨立。這便嚴重威脅了蘇聯的新政權，於是出兵蒙古，逐走白黨，於一九二三年訂立蒙蘇密約。一九三六年復訂互助協定。就法理論，外蒙的宗主權屬於我國，蘇聯這種做法，自是不合法的。據蘇聯方面的說法，則外蒙若不受蘇聯「扶助」，而我國這時候又不能加以保護，將必為反革命及侵略者所乘，適足會發生嚴重影響的，故其事亦出於不得已。

三、新疆問題 新疆在表面上是聽命中央的，但內部非常複雜，政治未上軌道，軍閥專權，時起內鬨，自民國成立以來，由楊增新，金樹仁先後統治，對人民一味高壓，怨聲載道，一九三六年

馬仲英亂自動率兵侵入迪化，是時蘇聯應盛世才之請，竟亦進兵新疆。不過據蘇聯說，盛世中央委任的官員，所以它的舉動是有根據的，並云察知馬仲英的行動受着幕後日人的操縱。

上述三事，當時都曾引起一時誤會，成爲至今未決之懸案。我們在這裏姑不論誰是誰非，但其事之大小在整個中蘇邦交所佔之地位如何，較之在艱苦抗戰中，蘇聯所予我們的寶貴的援助又如何，想必我們所能認識，不必深言的。

假使我們坦白地來研究是非問題的話，那顯見我們所根據的主要是法理，而蘇聯所根據的主要是事實。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執一辭，誤會乃起。其實，這些問題是並不複雜的，不難解決的，如果我們把敵人驅逐到鴨綠江彼岸，如果我們強大起來，無論怎樣邊遠的地方都有我們三民主義的力量，不是什麼問題，什麼懸案，都可以完滿地解決了嗎？

由上述蘇聯對歐外交歷史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外交史實來研究，我們對於蘇聯對外政策可以獲得一個結論：蘇聯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列寧主義的蘇聯有着廣闊的土地，豐富的資源，它在生產與分配上都有一定的計劃，它的本身是沒有足以發動戰爭的一切危險因素的，不過它仍有着足以引起黷武主義的侵略對它因素則是十分顯然的；它不願戰爭，儘可能避免戰爭，但卻不能不隨時隨地警戒着戰爭的來臨，這是它對於戰爭的看法。它是工農組織的一個政權，是被壓迫者打倒了壓迫者所建立起來的一個政權，它對於世界的弱小者，本同類相求，同氣相應的道理，是寄予着深切的同情的。綜觀二十餘年的蘇聯對外政策所表現的，雖極盡機變之能事，然而無有與此原則不相吻

合的。它堅持着自己的立場，以應變於急劇變化的國際局面，時而世界革命，時而集體安全，時而中立，時而反侵略陣線；在一方面顯然出乎它的需要，在另一方面，對於弱小民族的鼓勵，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亦是有其獨到之處，這是不容抹煞的。

至於談到與蘇聯辦外交的竅巧，以本席的經驗來說，本席以為蘇聯是有着它的一定立場，祇要尊重它，亦誠相見，事情就容易辦到，外交上一切慣有的陰謀手段，在蘇聯的嚴謹態度前面是往往無用的；與它的立場相合的，水到渠成，十分自然；相反，強求是不可能的。兩年前本席自莫斯科到倫敦，邱吉爾先生以本席能夠完滿地完成任務，頗為稱揚，那時英蘇的關係，並不融洽，所以會以此相詢，我當即據此坦直相告。現在英蘇已並肩作戰，關係的密切，史所未有，證明了本席的說話。

今天研究的問題原是很專門的，如果著起書來，可以成厚厚的一大本，但為時間所限，祇能就其梗概言之，此刻時間已經不早，就此結束。

關於「蘇聯立國精神」答客問

三十三年七月爲中央周刊之「對蘇聯的真切認識」特輯作

問：自從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開始，歐洲大陸十幾個國家都不能抵抗他的兇鋒，只有蘇聯苦戰三年，轉守爲攻，轉敗爲勝，不但驅逐強敵出境，而且現在已經直入波蘭和東普魯士——蘇聯之能成爲摧毀納粹德國的第一支主力軍，究竟爲什麼？

答：因爲在大陸上只有蘇聯的軍事力量最強。

問：蘇聯以什麼方法強大它的軍事力量？

答：蘇聯除了軍事訓練、軍事動員、武器補充、防禦工事等等都非常精強，使其能經常達到勝過敵人的水準以上外，更能隨時確定最正確的戰略，提高巧妙的戰術，以不斷地增進自己的軍事威力，保持永遠壓倒敵人的優勢。

問：這些似乎是軍事上必需的原則，德國方面也可以理解；問題是爲什麼蘇聯就能做得到如此完滿？

答：這就不專在於軍事本身，而是因爲蘇聯能使它的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完全與軍事配合一致，真做到「全體戰爭」的程度。

問：希特勒不是也驅使了德國一切的力量爲了他的侵略戰爭嗎？

答：是的。但他最後的效果必定是總崩潰，而蘇聯最後的效果却是總勝利；這原因就在於蘇聯的立國精神之根本不同了。

問：蘇聯的立國精神是什麼？

答：蘇聯這一國家創造的歷史，建設的方法，以及對國內國外的種種措施，至今還不免有些人不完全理解；其實在它自己是以簡馭繁始終一貫的。我以為蘇聯立國的基本精神有三種——

(一) 革命與進步的精神；

(二) 民主與團結的精神；

(三) 和平與戰鬪的精神。

問：請依次解釋一下，好嗎？

答：蘇聯共產黨組織工農，領導全俄大多數人民。以最勇敢最艱苦的長期奮鬥，推翻沙皇，建立蘇維埃聯邦，方向始終正確，態度始終堅決，這是革命精神。他們能一面澈底肅清國內的反革命力量，一面打退當時十幾國的軍隊，決不屈服於國外的壓力，這也是革命精神。但是僅止於此還不夠。革命政權建立以後，還要一個五年，兩個五年，三個五年的計劃。改進農村，建立集體農場，發展大規模重工業，力求經濟生產上的進步，頒佈新憲法，完成高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力求政治上的進步。掃除文盲，普遍設立學校，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智識，發展新的文學、美術、電影、戲劇和自然科學、探險事業等等，力求教育文化上的進步。以最大的力量努力國防事業、軍事訓練、強化

陸空海軍，力求軍事上的進步。此外，在外交上，協助弱小民族，參加國聯，號召集體安全，與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互助條約，首先主張制裁侵略，保障世界和平，最後與美英中國等反侵略國家合作，最堅決的打擊德寇，以求得國際地位的進步——這都是全世界人所共見的事實。人類原來爲了進步才需要革命；所以革命以後便須要不斷地進步；如果起初以革命而取得政權，取得政權以後便停止進步，反對進步，那就正是希特勒所以失敗的理由了。所以革命與進步在實質上是一個不可分的本精神。

問：革命與進步誠然是蘇聯立國的第一種特質，但革命是一種力量，進步也須要力量；蘇聯是怎樣才能鞏固和擴大這種力量的呢？

答：這就是全靠他們的團結的精神了。蘇聯名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是爲了消滅國內階級的對立存在。就是要把壓迫剝削大多人民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即是他的當時少數的特權者打倒，這樣才能實現最大範圍的民主政治。如果國內還有沙皇時代的特權階級，便存在着政治社會上的衝突。人與人不能平等互助而相處，試問怎樣能團結一致而成爲一種牢不可破的力量呢？現在蘇聯人民，不分男女，凡年滿十八歲者，除精神病者以及由法院判決在一定期間內褫奪選舉權者，都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選舉權；蘇聯憲法並保證人民有先期撤回代表之權（類似我們所說的罷免權）。蘇維埃代表成了人民的公僕，蘇聯真正實現了我們國父所說的「主權在民」的理想。蘇聯人民所獲得的言論、出版、集會、示威遊行、結社、身體、

居住、通訊、信仰等自由，非但有法律的確定，而且有實際的保證。此外，蘇聯憲法還規定人民獲有勞動權、休息權與教育權，因此在蘇聯國內，已消滅了失業和文盲的現象，人民的身體精神都是非常健全。享受着政治自由生活幸福的蘇聯人民，誰願意斷送自己的權利而受希特勒的奴役與屠殺？因此他們才每個人都要爲了保護自己可愛的祖國而拚命。這是政治上以民主制度所造成的團結。希特勒以爲蘇聯人民必有許多不滿於他們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一經戰爭，便會引起內部矛盾，這完全看錯了。蘇聯在民權平等以外，還能實行民族平等。自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國內各民族間便沒有了壓迫與被壓迫的區別。當年帝國時代除大俄羅斯以外，各民族政治地位既極低弱，經濟文化生活也很落後；可是現在都在隨年逐月地發展起來。一九二二年，各蘇聯共和國自願結合成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憲法第十三條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爲各平等蘇維埃社會共和國按自願聯合原則所組成之聯區國家」。整個蘇維埃聯邦是由每個聯邦參加政權共同統治的，由於「自願」，才有堅固的聯合；有了「平等」，才能鞏固民族的友誼。希特勒的入侵，使蘇聯一部份民族喪失了自由平等的生活，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平等的地位，斬斷了他們經濟文化的發展，蘇聯各民族人民自然會更加團結起來抵抗公敵。認爲紅軍一失利，就會使蘇聯各民族發生分崩這又完全是希特勒的妄想。我敢說，對於國內民族問題之解決，蘇聯在今日世界上是最成功的；而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實行民族間的民主制度，民族間有民主才能有團結。至於民生方面，大家都曉得，蘇聯二十幾年來的刻苦建設，使他們的國家經濟力量已超過了歐洲各國，僅

次美國，全體的人民的生活都一律得到豐衣足食，無有剝削人的富有者，也無有失業的貧困者，更絕無所謂社會經濟恐慌這個名詞。這原因是在於他們能夠做到了『各盡其能，各取所需。』全國任何人在經濟上都一律平等，平時毫無苦樂不均的怨望之心，大家休戚相關，安危與共，敵人打來之後，絕沒有少數人發財，多數人受難的事，這就是經濟上民主制度造成的團結。總起來說，無論是民族、民權、民生那一方面，沒有民主就不能團結；沒有團結就不能打勝敵人；民主與團結便是蘇聯立國的第二種基本精神。

問：蘇聯完成革命，鞏固和發展國內力量，確是已經成爲無法否認的事實。但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和蘇聯性質不同的國家還是很多，力量很大，而且國際變化又是非常複雜；任何國家都不能離開國際環境而閉門孤立生存，有人說蘇聯原是想一氣呵成完成世界革命的；他所謂的「一國之內建立社會主義」，不過是一時的手段；目前與盟邦合作，也不過是渡過今日難關；戰勝之後，蘇聯仍要向外推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甚至於有人說蘇聯既有如此強大力量，就很難保他沒有領土野心。在另一方面，蘇聯在過去，現在，以至於將來，常不免受人疑懼；或要防範他，或要孤立他，或要侵害他。但事實上他是越來越堅強了，這到底又由於什麼原因，他將來究竟怎麼辦？

答：這個問題是極重要的，不但我們應該要認識清楚，全世界的人也都會隨時注視着，需要深切的理解。蘇聯自己對這問題的解答便是他立國的第三種基本精神——和平與戰鬥。首先應說明的蘇聯由國內經濟制度的規定，無私人資本的發展，無人民失業的恐慌，無殖民地的需求，所以他根本

上無侵略別國的必要。所以若干年來常在聲明無領土野心。同時，他既主張弱小民族解放，又反對帝國主義，尤其他自己必須在一無戰爭的世界中才能安定地生存，他也不想別人的戰爭中乘機取利；所以他堅決反對任何種侵略戰爭，主張世界各國和平相處。我們「國父」在二十年前便說過蘇聯「這種新政策不但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這是真知灼見的話。最近蘇軍追擊德寇，直入波蘭，波蘭人民在解放的地區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與民主的新政權；蘇聯外交委員會便立刻發表聲明說：「蘇軍進入波蘭領土，充滿了單純的決心——擊潰德意志敵軍，並援助波蘭人民，從德寇羈絆之下解放出來，使獨立的強大的和民主的波蘭復興」。『蘇聯政府決不打算在波蘭領土上設立自己的行政機構，認為這是波蘭人的事情』。『決不追求關於獲得任何部份的波蘭領土，或關於變更波蘭社會制度的目的』。『紅軍在波蘭領土上的軍事行動，專為戰爭的必要，專為援助友好的波蘭人民從德軍佔領下獲得解放而迫於不得已。』像這樣具體而切實的自白，還不可以得到波蘭人民和全世界的放心嗎？我相信蘇聯對波蘭如此，對別的國家也一樣。至於過去在捷克被侵的時候，蘇聯主張和法英共同保障捷克，以後又主張和英法及各國共同制止納粹發動侵略戰爭；這都是爲了維持歐洲的和平。到了蘇聯與各盟國并肩作戰以後，第三國際宣佈解散，蘇聯毅然同意，也是爲了使全世界各國對所謂世界革命問題都能放心，而消滅法西斯挑撥的謠言，以增強各盟邦之團結。蘇聯自己是相信共產主義而施行蘇維埃制度的國家，如果有別的民族由自己全體人民的民主決定而採取和蘇聯同樣的主義與制度，乃至於自願加入蘇維埃聯邦；他必不拒絕。如過去立陶

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小國之實例。但蘇聯決不以武力強制別人效法自己，或以陰謀去顛覆別人的政權。他必須尊重別國人民對自己國家政治制度的選擇自由。他最多是幫助別國抵抗外患，自力更生，如對我們中國革命與抗戰之所行，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各聯盟共和國賦有編置各自的軍隊和對外國建立直接關係的權力，把國防、外交兩人民委員會，從聯盟的變為聯盟與共和國的人民委員會；這樣一來，蘇聯如要對外作戰，除非是保衛祖國的神聖戰爭，決難獲得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的一致的同意。所以這種措置，也充分表示蘇聯沒有侵略野心。

問：照此說來，蘇聯竟是一個善良的和平使者了。

答：雖然是善良，是和平，却絕不是一個無觀察力的愚人，無抵抗力的懦夫。有人說：『對於蘇聯，你若和他做朋友，和他交好，他是你最忠實的朋友；你若和他做敵人，侵害他，他也就是你最忠實的敵人。』這話是對的。誰要使他無端的『從火中揀栗子』，他決不上當。誰不先去打他，他決不先去打別人。所以他可以在希特勒未攻他以前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決不先發動攻德；但同時他早準備被任何人攻擊時的抵抗力量；等到一旦德國向他進兵，他便一口氣打到底，比任何一個國家打得英勇，打得厲害。在莫斯科、列甯格勒、斯大林格勒圍攻最危險的時候，他只知道竭盡全力，死命奮戰，決無絲毫動搖，終於把國家存亡所繫的三個城市，作了反攻致勝的發動點。在戰爭中，他常請求盟邦接濟軍需，更常呼籲開闢第二戰場，這是他深知道非大家合力不足以提早把納粹德國擊潰；但應該他自己做的事一絲一毫不放鬆自己，決沒有妄想因人成事或嫁禍於人。所以

他能成爲這一次世界大戰中擊潰第一個強盜的第一支主力軍，成爲使盟邦終獲勝利的第一種決定因素，毫無愧色。事到如今，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知道蘇聯民族真是一個不取巧，不畏難，「紮硬寨，打死仗」的鐵漢子了吧！戰鬥而不爲了和平，是強盜；只和平而不能戰鬥，那是甘受宰割的綿羊。蘇聯是根本主張和平的，但和平必須以戰鬥來支持它。蘇聯爲了和平，爲了自衛而戰鬥；他不怕侵害蘇聯和破壞和平的任何敵人；同時除了爲着和平，爲着自衛，他也決不使用戰鬥，別人也不必疑慮他無端的侵害。我們但看近年來蘇聯和盟邦——尤其是和美英的合作關係越來越密切，便可以曉得他完全是以自己的和平與戰鬥的精神換取得來的成果。從前有些人常在懷疑蘇聯與英美關係會中途變壞；德寇又常常散佈謠言說蘇聯將要與德國中途媾和，現在都被事實否定乾淨了。至於大戰之後，我相信蘇聯也一定本着過去一貫精神，一面努力求自己的經濟恢復，力量的更加鞏固，文化的更加提高；而另一面也要與各盟邦共謀世界的永遠和平，而決不許再有什麼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決戰」之發生。

問：日本帝國主義是蘇聯敵人德國的朋友，是蘇聯朋友中國美國英國的敵人，可是蘇聯至今還和日本維持中立關係，這怎麼解釋呢？

答：凡是施行侵略反對民主的力量，從本質上講都是蘇聯的敵人。但軸心的領導主力是納粹德國，直接打進蘇聯內地威脅蘇聯生存的是德國；蘇聯竭盡全力，還必須美英一致夾擊，才能戰勝德國，如果德國勝利，日本雖然敗亡，也終會變成法西斯世界，如果德國敗了，日本終無獨勝之可

能。這就是蘇聯必須集中力量打擊德寇的理由。而這一戰略是爲英美所共同認識的。如以蘇日關係而論，日本自然願意緩和蘇聯，不先發動攻蘇，以免多增敵人，在蘇聯則一面維持着不先發動戰爭的法則，一面却也經常準備着張鼓峯教訓日本的力量。現在西戰場的勝利結束不久就要來了。美軍對日本本土英勇的大規模的進攻，一天逼緊一天；而美蘇關係之緊密，蘇聯輿論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斥責，都是大衆所共知的。說蘇聯會在消滅德寇之後，還坐視東方存在着另一種侵略力量，毒害於明日的和平世界，那是他立國精神所容許的嗎？

問：蘇聯的立國精神與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比較起來怎樣呢？

答：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三民主義國家，在革命過程與建國制度上說，當然有不同之處。但若就兩國的基本精神而論，都應該是一致的。中國是以革命建國的，中華民國的成立還在蘇維埃聯邦成立之前，然而革命工作沒有澈底，進步程度趕不上需要。我們今日既須加強革命精神，更須力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切實進步，這是不能諱言的。中國的三民主義本是百分之百的民主路綫；而爲了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更非全民族各階層實行平等自由的團結不可。必須民主才能真團結；必須團結才是真民主，這也是一樣的道理。今天有誰在說中國應當不給人民自由，不許國內各民族平等，要使得社會貧富階級對立，各黨派關係分裂嗎？這民主與團結的精神，正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本要素。第三，中國過去主張世界和平，現在正爲和平而戰；將來更要求世界的永久和平。自然我們的戰鬥力量比不過蘇聯和英美；但如果真能發揚革命精神，力求進步，實行民主

政治，力求團結之堅強和平與戰鬥的信念；效法蘇聯，使政治經濟一切一切的力量都與軍事配合一致，不要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只當一句空口號。那麼全中國軍民的戰鬥力量自然會很快的加強起來。蘇聯的成功與勝利的另一種祕訣，便是常肯檢討自己的缺點，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以不斷地增強自己的力量。當年我們的國父，曾教我們學習蘇聯的革命，現在我們更要學習蘇聯的建國與抗戰。尤其首先認清蘇聯立國精神既然與我們根本上一致，就可以確信中蘇兩國關係必須更密切，更合作，把那過去許多無理解的猜疑，不愉快的障礙，澈底掃蕩清楚，以求共同努力躋登於世界和平之大道。

附錄

(附錄六節三十三條係自列次講演及所發表之文章中所摘引)

(一)

一、關於外交：(1)以澈底抗日爲目前外交上主要方針，而與其他各關係國作切實的互惠之聯合。(2)確定聯美及英法等國之方策，兼作對未來世界大戰之準備。(3)爲求遠東之與國，應積極進行中蘇邦交之恢復。(「集中國力挽救危亡草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四屆三中全會提案)

二、……抗戰前我們本有三條外交路線可走，一是親英美，二是親蘇聯，三是親軸心。如今我們只有一條了，軸心是我們的敵人，英美蘇已經團結合作，它們不僅在戰時即戰後也要團結合作下去，所以今天我們只有親英美蘇的一條外交路線，今天的形勢是要親英美非同時親蘇聯不可，反之亦然。……(「今後努力的方向」，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在憲政座談會講)

三、……今天橫在我們面前亟待我們求得合理解決的大問題，一個就是怎樣加強我們與盟國英美蘇的合作，以打破目前敵人對我們封鎖的局面……切實執行親美英同時親蘇聯的外交政策，以求盟國團結的加強。美英蘇中是這次反法西斯侵略的四大支柱，四大國家要求澈底擊滅東西茲爾斯，

爭取戰爭的勝利及和平的勝利，必須在戰時和戰後親善合作始終無間。美英蘇的合作精神和事實已充分表現在西方擊滅法西斯德國的偉大的戰鬥中。……同樣我們在東方要澈底擊滅法西斯日本，除了美國在太平洋的攻勢以外，還要從亞洲大陸上進攻日寇本土，將來美英蘇中的協力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相信，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蘇聯絕不會放棄他在太平洋上應負的責任。近年來美英蘇間的親善合作已是極顯著的事實。

年來有些人或認為祇要獲得美英的援助，即可爭取抗戰的勝利，也有些人認為親蘇便不能親美英，他們的認識都是錯誤的。不知道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外交路線只有親美英蘇一條大道。要親美英更非親蘇聯不可。大家要知道蘇聯英勇的戰士，過去在中國戰場上流血犧牲，與今日美國戰士之與我們並肩作戰，是沒有不同的。將來美，英，蘇，中的戰士共同流血在東方戰場上。更是這次澈底擊潰日寇的必然結果。戰後法西斯軸心國家失敗消滅以後，美英蘇站在一起共同建設世界的和平。我們如果因為要親美英而疏遠蘇聯，不與三大盟國共同親善合作，那真是「愚不可及」了。（「我們唯一的路線」，民國三十三年七七紀念發表）

四、這個和平建設的工作，在亞洲，首先要由中蘇兩國密切合作，在戰後迅速重建亞洲及世界的和平。中蘇善鄰合作，實事所必然。因為：（1）中蘇都是革命建國的國家，相互間素表同情。（2）中蘇都愛好和平，反對侵略。（3）中蘇都是地大物博的國家，除要求恢復國土外，無向外擴張領土野心。（4）中蘇都和英，美民主國家親善，戰時戰後均相互合作。（5）戰後中蘇均

須休養生息，從事復興建設。（6）中蘇兩國，都在賢明偉大領袖領導之下，抗戰建國。（「擊敗敵寇在今年」，三十三年元旦發表）

五、……我們要研究蘇聯今後是不是要中國實行共產？現在英美政論家的看法，以為這是不會的，因為今後蘇聯要避免對世界樹敵，必不會策動別的國家行共產革命。從前因為他們四圍都是敵人，沒有辦法才採取那手段。現在則情勢不同，英國美國與他成爲很好的盟友，尤其美國幫助他最大。國際環境既然類與世界合作，不能使人對他懷疑戒心，他如果要中國共產化，德國共產化，別的國家一定會聯合起來防備他。他要準備戰後一二年裏復興，發展國內事業，自然不願意再與別國打仗，所以對德國不願意他共產，也不利用共產黨，祇希望戰後德國成爲民主的德國。他接近英美，使英美放心他，使現存的關係可以維持下去。對中國也是這樣，希望中國對他諒解，維持友好關係，親睦善鄰。……（「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在中央組織部講）

（一一）

六、……爲什麼聯蘇，與使抗戰的勝利，成爲革命的勝利有關呢？這個理由也很明顯。就是因爲要使抗戰勝利，成爲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抗戰軍事勝利之後，真正實現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使中國不但成爲一個強國，而且成爲一個富國，不但強且富，還要做到人人均足的地步，達到長治久安。這固然有賴於我們自己的努力，而尤其要借鏡於「革命先進的國家」，仿效他的革命

精神，證驗他的經驗與教訓，來更加速我們革命的大成功，完全實現 國父畢生革命的目的。
 (「爭取抗戰和革命的勝利」——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發表)

七、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幾十年前，許多人以為這是二種理想，萬難行得通，可是在總理這種主張宣布以後，俄國的革命與建國相繼成功了。他們成功的道理，還不是靠實行土地國有這個政策麼？俄國革命的時候，所有工業，破壞殆盡，財源是靠土地革命而來，到現在不過二十年，一躍而成了工業國，列入世界列強之林，要歸功於土地國有政策。我們想，人家行得通的，我們何以行不通呢？人家的成功，是用革命方法得到的，我們不用革命方法，能希望他成功麼？……我們以農立國，和二十年前的俄國是一樣的，所以俄國便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如參考俄國的方法來建國，並不是要抄襲俄國的方法，而是實行總理的主張，因為國有的平均地權，和俄國土地國有的目的是同樣的呀。(「抗戰期間的經濟政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中樞紀念週報告)

八、本黨的組織系統，其最重大的改組，是民國十二至十三年在總理領導之下，在廣州進行的劃時代的那一次的改組。十三年一月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現行的本黨總章，成立了組織的系統。因為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前，黨的機體是太鬆懈，沒有嚴密的組織，不甚現代化，力量亦不能集中。所以當時 總理指示，要我們學習人家的長處，採取人家的方法；所謂學人家長處，採人家方法，就是採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方法，學他們的辦黨經驗。不過這絕不是說要學習人家的主義，因為我們已有很適合於中國的三民主義，無需乎舍己從人。因為我們辦黨的作風，組黨的主

法，那時實嫌與時代太落伍了，所以我們和蘇聯洽商，借派鮑羅廷先生來當我們黨的顧問。鮑顧問到達廣州之後，和我們會談，經過好幾個月的研究，乃由臨時中委會推定幾位同志——廖仲愷，本席，還有一二位——擔任起草總章。總章所訂的組織體系，改變了從前的辦法；從前黨部的負責同志，是由總理派定，總章沒有採用這個指派的辦法；新的組織系統可說是從下而上，從基層逐級到上層，每層組織，都由黨員大會，或地方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該級的執行委員會，最後乃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監委員。（「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在中央組織部講）

九、現在全世界物價都沒有像我們這樣高！你說我們沒有採取上述的辦法（指「增加稅收，提倡儲蓄，發行公債，定量分配，限制消費等等」）嗎？也不盡然。爲什麼不能收效？很簡單，大家碰到了困難使轉灣，上述方法沒有切實去做，祇靠發行鈔票，當然走到惡性膨脹的路上去了！到今天爲止，我認爲假使改變腦筋，不畏困難，聚精會神來做，這個難關還是可以打破。雖不能回復到戰前的狀況（也用不着回到戰前的狀況），但總可以穩定下來，不過這個問題的解決單靠政府一紙命令是沒有多大的把握的，我們要發動全體黨員團員，我們可以仿效蘇聯的辦法，組織挺進隊，某一個地方發生了困難，馬上派人駐在那裏，把困難解決了才回來。在中央，在地方，那些問題最困難的，應該集中力量先把它解決。蘇聯共產黨所以成功，這是很要緊的一着。（「一得之見」，三十三年四月三日在青年團大禮堂講）

十、工業化的辦法，可有兩個途徑，第一個是蘇聯的辦法，舉國上下節衣縮食，含辛茹苦，埋頭從事於工業建設，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乃大奏成功。不過這是當時環境使然，所謂萬不得已的辦法。

第二個是吸收利用外資的辦法，是仰賴國外的投資，以補救我國建設資金的缺乏。……（「說左右」，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組織部黨務人員訓練班講）

十一、蘇聯工商業統統由國家經營，廢除私人經營，這種辦法也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和客觀條件，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抄襲他的老方法。我們將來的經濟建設，一面參考蘇聯的辦法，一面也可參考英美戰時的生產統制。（「政治民主化，經濟計劃化」，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

（三）

十二、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用一種革命的手段，把從前沙皇貴族，大地主，及資本家完全推翻，廢除貴族僧侶，平民及農奴等階級之分別，以掃除革命障礙，使一萬八千萬人祇有一個階級，造成全民政治。（「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二十九年四月八日在中央訓練團講）

十三、蘇聯因為只有共產黨，英美輿論在過去也總認為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蘇聯政治作風，

在形式上沒有反對黨同時存在，最高蘇維埃一年一次大會祇有宣傳作用，等於開大會來聽聽報告而已。蘇聯的立場則以為他們不能有第三黨因為國內都是工農智識無產分子，沒有地主，和資產階級，所以無須產生第二個黨。（「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在中央組織部講）

十四、蘇聯政權當初也是用革命手段來建立的，情形和我們革命建國一樣；但成功以後，即頒布憲法，選舉結果仍由他們組織政府，所以我們可以說，他們是民主的，因為他們的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的方式而產生。（同上）

十五、從前英美輿論界批評蘇聯，曾說蘇聯雖做到經濟自由，却沒有政治自由，其意是說：蘇聯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解決人民的生計問題，人人有工作，有飯食，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脫離了失業飢餓的威脅。可是蘇聯的民主，祇是一黨政治，不是英美所行的政黨政治，所以指責為沒有政治自由。過去十多年來這種論調很是流行，在當時蘇聯方面則反唇相譏的對英美批評者說：你們所強調的政治自由是怎樣呢？在我們看來，你們的自由祇是人民有失業的自由，有飢餓的自由而已。其意是據：英美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雖予人民政治自由，可是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却沒有充分的保障，每逢國內經濟恐慌，人民立受失業的威脅，所以社會主義者譏訕資本主義的政治自由，為工人失業的自由。（「論三種自由」，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在憲政座談會上講）

十六、曠觀世界各國，現在能夠同時獲得三種自由的，就是說：對於民族，民權，民生，都已

不成問題的，據本人觀察，只有蘇聯可說是庶幾近之。這次大戰中，蘇聯因爲具備了這幾個條件，所以戰績最著。三年前納粹德國差不多把歐洲置於他鐵手支配之下，方掉過槍頭來進攻蘇聯。不少觀察國際情勢的人，很多替蘇聯擔心，但是蘇聯却能全國動員，實行英勇而有效的抵抗。所以能表現這樣偉大的力量，就是因爲他們已享有這三種自由，在建國二十年後，已解決了這三個大問題。民族自由一旦被人侵犯時，舉國人民便爭先恐後的起來，與敵人搏鬥，不勝不止。（同上）

（四）

十七、我們中國人還有些人對於蘇聯的看法也不大清楚，以爲蘇聯爲什麼不趁這個機會出兵打日本，好使我們抗戰早日達到勝利的目的，蘇聯自身也可以解除日本的威脅。殊不知蘇聯的立場，是不肯輕易啓發戰端的，但同時也絕不對侵略者稍有退讓，所以過去幾年來，日本在蘇聯邊境挑釁，蘇聯屢次予以迎頭痛擊，諾蒙坎邊境衝突，日本曾犧牲了一萬六千人，消滅了整個的兩個機械化師團，幾乎全軍覆沒，這樣才向蘇聯屈服，訂立了諾蒙坎休戰協定。……至於說蘇聯同日本妥協，犧牲中國，那更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國際現勢與中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國民外交協會第三團體歡迎會上講）

十八、……蘇聯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能和德國訂互不侵犯協定，將來也許可以同日本訂互

不侵犯協定，都說不定的。假如姑在蘇聯的立場，日本肯把防共反蘇的行動取消，向莫斯科鞠躬作揖，請求以後互不侵犯，蘇聯或許可以答應他的。蘇聯雖然對日本協定互不侵犯，可是對中國的援助態度，始終不會變的。因他有他的國策，國策是自己定的；誰也不能越俎代庖要求人家執行自己的意思。……（「利用國際時機促成我抗戰勝利」，二十九年十月卅一日在立法院講）

十九、百年來，日本軍閥的陸軍的假想敵，就是蘇聯與中國。你們遠東紅軍的設防。曾經牽制着它數十師團，（中國五年的抗戰更消耗並吸住了它百萬大軍，我們在客觀上早已是相為扶持着的。目前，我們在奮勇作戰，蘇聯在歐洲積極反攻之餘，還能不斷增強東方防務，正說明着我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廣播）

二十、談到這一點，一般人當然聯想及蘇聯對日的中立問題。認為蘇日間曾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簽訂中立條約，蘇日間至今還是維持着中立的關係。很多人對此種微妙的情形不容易明瞭。但是我們如果細心研究蘇聯的處境，那就能明白蘇聯當前最大的敵人是德國，不是日本，所以蘇聯的立場是以中立條約來緩和與日本，爭取準備的時間，並且盡可能的延長這個準備時間以便專心對付德國，等到德國發動，然後由全力來抗戰。自前年六月二十二日到現在，德國以數百萬大兵向蘇聯進攻，許多領土都被侵略，首都也曾一度危急不可終日，受很大的威脅，這充分證明德國的力量較強，其威脅也較迫切，而日本的力量較薄弱，威脅也較緩和，所以蘇聯的立場是先對西方的大敵，再回頭解決東方的敵人，以中立條約來延緩日本的夾攻。敵人對此自然也心裏明白，所以敵人自前

年六月至現在，在我東北的邊界上，祇有加強兵力，爲什麼他要增兵呢？就是認爲中立條約完全是表面的文章，協定簽訂以後，蘇聯並沒有撤兵，因此敵在我東北的駐兵，也不敢撤退，結果中立條約仍舊不能解除互相威脅，互相提防的局面。（「輪迴戰爭提早勝利」，三十二年十一月七日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六週年發表）

二十一、屆時相信，盟邦蘇聯必能揮戈東指，參與殲滅倭寇的戰爭，我們這種期望和相信，至少是由於（1）蘇聯是我們的盟國，過去所以未參與遠東方面的戰爭，只是爲了要避免分散兵力，其與侵略的軸心國家作戰，則無異致。（2）軸心侵略勢力，原是一體，蘇聯消滅德寇後，當轉而參與消滅倭寇之戰，始能達到澈底剷除侵略禍根的目的。（3）蘇聯與太平洋有密切的關係，有共同維持太平洋和平的義務，欲維持太平洋和平，必須消滅倭寇。（4）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世界不能一部份自由，一部份不得自由。（5）蘇聯欲永遠除去其遠東的威脅，當乘此千載一時的機會，協力殲滅倭寇。（「擊潰敵寇在今年」，三十年元旦發表）

二十二、……德國打敗以後，蘇聯會不會參加對日本戰爭？在我們立場想，歐州戰事了結，英美集中力量對日本，蘇聯也有參加對日作戰的可能。這個看法要是不錯，蘇聯出兵打日本，在什麼地方呢？一定在東北，就是現在的偽滿。假使蘇聯進兵到東北境內，把敵偽肅清了，相信蘇聯決不會久佔東北，末了還要撤兵的。（「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三十三年三月九日在中央組織部講）

(五)

二十三、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自此，全世界的人民直接捲起了戰爭的漩渦。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一個新形勢，這新形勢的特徵是國際侵略勢力與反侵略勢力走上決戰的階段。……

這一個國際反侵略的世界戰略在現階段必須做到：(1) 加緊援助目前正在與侵略勢力正面作戰的中國與蘇聯；(2) 加緊援助其他被侵略被奴役的人民；(3) 太平洋上，中蘇英美聯合一致對日本侵略者加以制裁，澈底解除其侵略武裝；(4) 在歐洲英美蘇配合作戰，澈底解除納粹德國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侵略武裝。(「論國際反侵略戰爭的新形勢」，三十年八月發表)

二十四、自從六月二十二日，德國侵略者開始進攻蘇聯以來，蘇聯全國人民，便在其偉大領袖斯達林領導之下，鐵石一般地更團結起來，保衛着他們的祖國，保衛着世界的正義和平民主自由。……

今天蘇聯正和中國一樣，是立在全世界反侵略陣營的最前線上，代表着人類的正義，以與侵略暴力相週旋。蘇聯的勝利，不僅是保護着蘇聯人民的生存與自由，而且是保護着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的無數人民的生存與自由。今天各種的抗戰，實為世界前途光明與黑暗所繫。……(「預祝蘇聯抗戰勝利」，三十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紀念發表)

二十五、……蘇聯紅軍是一萬九千萬堅毅，沉着，而英勇的蘇聯人民底優秀份子，他們具有豐富的革命戰爭的經驗，他們深澈了解，擊敗納粹德國的世界意義。他們知道希特勒奴役下的各民族和人民，是仰望着蘇聯的勝利，以求取解放的。（「擴大輝煌的成績，爭取共同的勝利」，三十二年二月紅軍節發表）

二十六、……當二十個月以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挾戰勝之餘威背信閃擊蘇聯。那時候蘇聯的形勢固然很危險，有識之士亦莫不為世界文明前途担心。然而由於蘇聯紅軍的艱苦奮戰，不獨它的祖國轉危而安，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逆轉形勢且為之改觀。在蘇聯紅軍作戰的那些時日裏面，它吸住了法西斯的巨大大軍力，殲滅了千萬以上的野蠻匪徒，毀壞了它無數的飛機坦克，這使得英美諸盟邦得以從容整軍經武，加緊戰時生產，以充實聯合國圍擊強敵的威力。時至今日聯合國國家能操有必勝之券的，神勇非凡的蘇聯紅軍的貢獻實不可謂少。（「慶祝蘇聯紅軍二十五週年紀念」，三十二年二月發表）

二十七、在今天，我們回憶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兩個歷史的偉大戰役，和今年三月底才告結束的蘇聯冬季攻勢的勝利，使我們不由得不能及那成千成萬的為熱愛祖國而犧牲的蘇聯民族英雄，他們的頭顱和鮮血，不但沒有虛擲，沒有白流，不但偉大的蘇聯藉仗他們的犧牲而得到保障，就是世界的正義與和平，也因此重新獲得了它的光輝，彌漫着全歐洲的悲哀與黑暗，才得到一個光明的轉機，歐洲受迫害，被奴役的人民才重新發覺他們的希望。

然而，蘇聯英勇抗戰的貢獻，並不僅僅局限在歐洲一方面，它對全世界的反侵略戰爭，也有其不可沒的功勳。這因為軸心的腐惡勢力原是渾然一體，而全世界的反侵略戰爭是不可分割的，蘇聯在歐洲的勝利，與中國在亞洲的勝利，英美在非洲與太平洋的勝利，都祇表示一個意義，就是民主反侵略的勝利，這個勝利是全人類的勝利，是預兆德、義、日人民獲得自由的勝利。……（「祝蘇聯抗戰勝利的兩周年」——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

二十八、蘇聯紅軍的對反對法西斯的現行戰爭所作的無可比擬的貢獻，這在目前已經是人所共見的事實，至於在將來戰後世界和平和安全，它將演着的角色，其地位之重要，那也是不難想到的。它，在這次戰爭的嚴格試驗之後，不論在歐洲或亞洲都是一支最強大的軍隊。它將屹然雄峙在從非尼斯特至白令海峽之間的廣大土地上，警戒着保護着它的祖國從事於復興再建工作；也就是這樣，它担起了維持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部份責任。它是戰後世界秩序的一項強大的安定勢力。（「蘇聯紅軍對戰爭和平的偉大貢獻」三十四年二月紅軍節紀念發表）

二十九、蘇聯紅軍正式佔領納粹首都——柏林的消息，給予我們以無限的鼓舞。這是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是全世界民主的大勝利。這證明了只有民主的武力，無敵於天下。而尤其是英勇的蘇聯紅軍將士們，首先表現了結束歐戰的偉績，這對於人類文化與公共安全的貢獻，真是無可比擬。我不能不同閣下以及你所領導的英勇軍民，表示敬佩與慶賀。現在民主最後的威力，必須提早結束東方侵略者之命運。中國人民誓必消滅盟方最後的公敵法西斯日本，我們決不放棄懲戒東方強盜的

責任，爲了永遠消滅東方侵略的威脅，我相信閣下必有深切的認識和卓越的決策，使全世界得到另一種極可興奮的消息。（「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致史達林大元帥電」）

（六）

三十、……蘇聯科學之成就，不但忠誠服務於社會主義之建設與各民族之福利，而且於此次反法西斯戰中，復傾其全力，克踐所學，爲消滅人類公敵保障世界文化而貢獻無比之智能，其豐功偉績，爲全世界所讚佩。敵人深信世界民主必得進步科學提攜邁進，相得益彰；而國際和平亦更賴於智慧合作，文化合流。此次大會集世界學者於一堂，以文會友，顯示學術無國籍，其進而樹立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之基礎，可預卜也。中國科學正在萌芽，有向我「兄弟之邦」學習者甚多。兩國友誼正在發展，須賴文化交流，藉以加強自信者亦實深。……（致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賀電，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發）

三十一、中蘇兩大邦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文化原係人類精神的至高表現，民族生活的最具體的代表物，倘能經常接觸，相互觀摩，感之以真，動之以情，實大有益於增進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認識與了解的。抑且就文化的發展言，這一工作也是極有價值的。如所周知，文化交流之後果，一種新的更高級的文化將於焉產生。……在這里特別要指出的，中蘇兩大民族源流久遠，歷史卓著，而革命後的蘇聯新文化的成就，復極迅速而優異，至近年以來中國新文化

的進展，亦頗足稱道。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中蘇文化之交流，不僅可使兩國邦交益趨敦睦，兩國文化，亦能加強國際合作，提供世界文化以更豐富的內容的。（序「交流」，三十三年一月）

三十二、我們對於蘇聯的研究……首先，就性質來說，過去的工作大多重在通俗的介紹和直接的翻譯。當然，這種工作是有意義的，但我們決不能以此為滿足。明白的，要對蘇聯獲得明確的瞭解，便不能不有精密具體的探討，要學習和取用他們的寶貴經驗，就不能不先經過一番分析和消化的功夫的。而要如此，我們勢非把研究的水準提高不可，務須求工作的往深處發展。

其次，就我們範圍來說，現有的工作大概編於藝術文學方面的。除此之外的各種方面尙少接觸，諸如自然科學方面的各部門的學問更少有人去注意。可是事實上，蘇聯在存在的二十五年中，無論那一方面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曾有過偉大的發見和成就。顯然的，要對蘇聯獲得全面性的認識，和儘量地接受他的長處，我們是必須把研究的範圍大大地擴大。（「加深和擴大對於蘇聯的研究」，三十二年一月）

三十三、高爾基先生是蘇聯偉大的文學作家，他逝世到今天不過六週年，他生平經過幾個時代。革命以前的帝俄暴政，他是親眼看見的。他是平民出身，所以最能了解一般人民的痛苦，寫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的意志，他不是單純的文學作家，只是寫些有趣味的小說歌劇本而已。他是一位革命家，以文字喚起當時的人民參加革命的運動來推翻沙皇的暴政，以建立民主政治。他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替人民抱不平，打倒不平的，他在俄國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當中，直接間

據參加過許多的革命工作，建國工作。到最後幾年看見世界上發生一種新的專制，就是一九三三年德國國社黨勃興起來，希特勒操縱政權以後，樹立反動的力量。知道歐洲的局面，不僅是歐洲，恐怕世界的局面，將被這種反動的勢力擾亂。乃警告世界上愛好和平自由的人，要大家注意。所以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文章，都是反對德國法西斯的，他要全世界上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想法子制裁法西斯，防止他的發展。當時一般人還沒有看清法西斯的陰險，所以對高爾基先生的作品，還不大注意。以最近幾年所發生的事實，才知道高爾基先生的眼光遠大。他向世界警告所舉出法西斯的陰險，現在一件一件的實現出來，我們今天紀念高爾基先生要了解他的生平，他不僅是一位作家，同時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對於人類的貢獻，非常偉大，他喚起人民推翻沙皇的專制，而建立共和的政體，又喚起人民努力建設，以奠定堅強的基礎。蘇聯今天能夠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戰爭，且一年以來，愈戰愈強，都是他對人民貢獻的成績。（「屈原與高爾基的紀念會上講」）

——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十一團體合辦的屈原與高爾基的紀念會上講